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包头老茶汤



老茶汤竟无半点茶叶踪迹。

【一言】

从铜壶『褶皱』里寻觅新生『密码』

□范永

老茶汤,这一源自明清、盛行于塞外的茶食,曾是包头人最温暖的市井记忆。而在今天,这一美食似乎只有在节假日才能被看见。

因此,武永龙夫妇手中这把龙嘴铜壶所传递的包头人共同的味觉乡愁就显得愈发珍贵。老茶汤是“慢生活”时代的“生活美学”。这是传统社会带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生活珠宝”。但在今天,如何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俘获人们的味觉,如何在继承传统食品的制作方法中获得不同年龄人群的青睐,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话题。

老茶汤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在于其蕴含的“慢文化”哲学。在快的生活节奏中,有时慢反而呈现一种“比较优势”,它成为一种“稀缺性东西”。如同钓鱼,在慢悠悠的期待中,钓的过程被调适为一种情趣,慢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快的紧张感。

我们应将其制作技艺与过程转化为可视觉化的“生动叙事”——通过透明厨房展示的十二道炒米工序,用温度计实时显示水温变化,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时间沉淀的味道”和“可观赏的乐趣”。这样,消费经济就转身为“体验经济”,“物质的享受”与“精神的愉悦”油然而生,消费者自然乐在其中。

当然,老茶汤还需要在慢功夫之外,寻找更多的新生“密码”。如是否可以融合其他食材,结合健康趋势推出创新口味,满足多样化需求;是否可以通过茶馆、艺术展览、新媒体直播等场景,将老茶汤与生活美学结合,提升多重消费体验;是否可以通过智能化设备,利用传感器监测水温、冲泡时间,实现精准控制。

此外,老茶汤要获得新发展,也需要重构其价值定位。要抛弃传统认知中“廉价食品”标签,要从寻常饮食跃升为文化象征的产品,要通过场景赋能实现其价值提升。如在五当召文旅景区设置禅茶空间,将饮茶过程与蒙古族待客礼仪、走西口文化相结合。

据非遗研究机构的调研显示,73%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附加文化体验支付30%以上的溢价。这为老茶汤的价值重塑提供了可能。

包头老茶汤的新生,既不能是僵化的传统守护,也不应是讨好市场的削足适履。它需要在传统配方与现代口味间找到黄金比例,既要保留龙嘴铜壶的温度,也要拥抱数字时代的流量;在坚守小米面的原味中,也能满足年轻味蕾的需求,在时光的热度中持续绽放芬芳。

百年铜壶里的光阴滋味

□本报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曹瑾

“茶汤”二字,常引人遐想——是茶的清冽,还是汤的温润?然而包头老茶汤,竟无半点茶叶踪迹。它之所以以“茶”为名,奥秘尽在“沏”字之中。那冲茶股滚水高冲的技艺,与茶道之韵异曲同工,便借了这“茶”字的雅意。这名称本身,便是先民智慧与语言艺术的结晶。

茶香无茶:溯源里的宫廷遗韵与民间烟火

茶汤的渊源,可上溯至明代宫廷。明代《酌中志·饮食好尚》所载“茶汤”,便已是御膳珍品,其八宝风味仅为朱门专享。清廷定鼎,深宫秘味终随旗人贵族流入市井,在京津之地落地生根。

当走西口的商旅驼铃回荡在阴山古道,这碗凝聚着宫廷气韵的珍馐,也悄然抵达塞外,在萨拉齐的烟火气里寻到了新家。它巧妙融入当地丰饶的小米物产,经百年时光与无数巧手淬炼,终成今日醇厚绵长的包头老茶汤。

2012年,它正式被列入包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百年漂泊与扎根的传奇,自此有了官方的文化背书。

匠心独运:一碗茶汤里的乾坤

在武永龙夫妇坚守的金街小店里,时光仿佛被茶汤的香气凝滞。武记茶汤已走过百年,武永龙与妻子闫文英,是这门手艺的第四代传人。

“原料就是茶汤的命脉。”闫文英指尖轻捻起金黄的小米面,认真地说:“小米一定要选向阳坡地长的,颗粒饱满油亮;磨面还得是老法子石磨慢碾,留得住香气;水更是马虎不得,非得是清冽甘甜的好水不可。”

案头之上,宁夏枸杞红艳如珠,新疆葡萄干饱满晶莹,上等芝麻、瓜子仁、山楂碎、红白糖排列齐整——这些看似寻常的辅料,每一味都千挑万选,是成就一碗地道茶汤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

最令人屏息的,无疑是那令人叹服的冲制技艺。武永龙稳如磐石,双脚立开半蹲,这“茶汤马步”是数十年功力所凝。

右手执那重逾40斤的龙嘴大铜壶,左手托碗。只见壶身倾斜,一道滚烫水柱自高高昂起的龙嘴激射而出,如银龙入海,凌空划过一道优美弧线,精准注入碗内。

米面在沸水冲击下翻腾旋转,瞬间化作一碗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的杏黄米羹。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力道、角度、水量妙到毫巅,堪称力与美的无声交响。

而真正的“绝活”,在于那令人叹为

秋日的包头金街,天气依然炎热。茶汤师傅武永龙双脚稳扎马步,深吸一口气,古铜色的手臂筋肉微绷,将沉重的龙嘴大铜壶缓缓倾斜。

刹那间,一股清冽如泉的开水自高昂的龙嘴激射而出,精准无误地注入盛满小米面的青花大碗中,质朴而浓郁的醇香迸发开来,杏黄色的米羹在碗中迅速凝结,晶莹剔透,如同封存了百年时光的琥珀,闪烁着诱人的光泽。

这碗看似滚烫的茶汤,此刻却成了消解酷暑的奇妙之物。当那温润粘滑的羹体滑入喉间,带来的并非灼热,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熨帖与回甘。

它早已超越了简单解渴的范畴,是包头这座城市在滚烫季节里,一份沁人心脾的文化清凉,一项承载着历史记忆、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活态传承,散发着古老技艺的生命力与独特魅力。

【见证】

玻璃闪耀丝绸之路

□王宗

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来自于遥远西方的玻璃器皿,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墓的出土文物中,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回答这一问题,还要从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辽墓说起。

1985年6月,在距青龙山不远的通辽市奈曼旗布格图村庙子山修建水库时,发现了一座古墓。经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扬名中国考古界、被西方人称为契丹文化奇迹的“辽代陈国公主墓”。

1992年8月,被盗扰的耶律羽之家墓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抢救性发掘。该墓群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克图山(裂缝山)。由于历史价值巨大,该墓葬群位列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另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吐尔基山辽墓位于通辽市科左后旗,是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一座未被盗掘的千年古墓。该墓的发现,在研究辽代的社会风格、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处古墓,虽分处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和科左后旗,但他们有一共同的特征:墓主人是生活于辽代早期和中期的皇亲国戚。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墓葬均出土了精美的玻璃器皿。

众所周知,最早的玻璃制品发现于四千余年前的两河流域,后经古罗马、中西亚传入华夏地区。

在辽代贵族墓葬的随葬品序列中,玻璃器占据着特殊地位。这些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珍品,以各自的形态诉说着不同的文化源流。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七件伊斯兰风格玻璃器皿中,长颈刻花玻璃瓶最为典型——折肩平底,几何纹饰深刻,成分检测证实其为典型的钠钙玻璃。此类“蔷薇水瓶”在阿富汗、伊朗屡有发现。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7件精美玻璃器皿,被视为考古界研究中古时期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重器,均来自西亚地区的叙利亚、伊朗一带。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吐尔基山辽墓中那只高脚玻璃杯,当考古人员揭开棺椁时,它依然保持着在墓主漆案上的姿态,杯壁泛着绿光,气泡在千年流光中凝滞如初。这些脆弱却坚韧的琉璃之器,正是辽代多文明交融的璀璨见证。

耶律羽之家族墓虽多遭盗扰,随葬的玻璃制品均已碎成残片,但在那墨绿色的光晕中,仿佛仍能看到商队西来跋涉的身影。

通辽市文博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室主任姜子强曾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足以证明辽代对商业贸易和互市极为重视。所以辽代与其相邻的国家、部落,以及远在西域或西亚的一些国家,也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契丹的繁荣,吸引了各国使节和诸方商贩纷至沓来,西辽河流域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中心之一。”

辽史研究者一致的观点是:在辽代社会,玻璃器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符号。当王公贵族“斗富”时,晶莹剔透的玻璃器皿被视作比黄金更珍贵的奢侈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物质稀有性,更在于承载的异域文化资本。

这些珍品在墓葬中的位置映射出主人的眷恋——吐尔基山玻璃杯端立墓主漆案之上。辽人对玻璃器的珍视,体现了对异质文化的主动接纳,更彰显了统治阶层通过掌控国际贸易网络强化权威的政治智慧。

玻璃器的流转轨迹揭示了被传统史书忽略的交流通道——草原丝绸之路。这条横贯东北亚的交通网络,从燕山北麓延伸至日本海西岸,与蒙古草原丝路衔接,形成“直通地中海的文化血管”。

辽代玻璃器的文化旅程,映照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逻辑:

制度层面——多座辽墓墓志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并用,医巫闾山遗址中胡汉礼制的融合,体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

精神层面——陈国公主墓志盖十二生肖雕刻与耶律羽之墓墓门尉迟恭门神彩绘并行,儒家伦理、草原审美共生于同一时空。

这种交融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如玻璃溶液般在高温中熔铸成全新物质——辽人在马背上移植唐制,开创五京体系;在游牧传统中吸纳农耕文明,形成“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当陈国公主佩戴伊斯兰玻璃器长眠,当耶律羽之墓多元文明器共处一室,多文明共生已从物质存在升华为精神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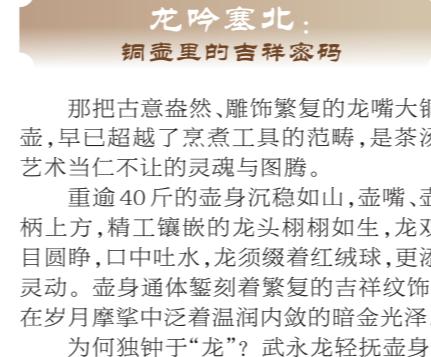
当我们在吐尔基山玻璃杯的气泡中看见古罗马匠人的呼吸,在陈国公主的蔷薇水瓶上触摸波斯纹样时,便触碰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基因:器物会碎,丝路有兴衰,但文明因交流而铸就的共同体意识,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淬炼成不朽的琉璃之光。



参加非遗展示活动。



令人叹为观止的扣碗绝活。



龙吟塞北:铜壶里的吉祥密码

那把古意盎然、雕饰繁复的龙嘴大铜壶,早已超越了烹煮工具的范畴,是茶汤艺术当仁不让的灵魂与图腾。

重逾40斤的壶身沉稳如山,壶嘴、壶柄上方,精工镶嵌的龙头栩栩如生,龙双目圆睁,口中吐水,龙须缀着红绒球,更添灵动。

壶身通体雕刻着繁复的吉祥纹饰,

在岁月摩挲中泛着温润内敛的暗金光泽。

为何独钟于“龙”?武永龙轻抚壶身,

道出其中深厚寓意:“这技艺根在皇城北京,那是真龙天子的居所。龙为水之灵长,

行云布雨,泽被苍生。从这龙嘴里流出的水,就是带着福气、带着吉兆的‘吉祥水’!”

铜壶不仅是冲制茶汤的利器,其本身

更是承载着追吉避凶、祈求祥瑞的民间信仰,

是中华龙文化在塞北日常饮食中的生

动投影与活态延续。每一次龙口倾泻的滚水,

都仿佛是对古老祈福仪式的无声复刻。

右手执那重逾

40斤的龙嘴大铜壶,

左手托碗。只见壶身倾

斜,一道滚烫水柱自高高昂起的龙嘴激

射而出,如银龙入海,凌空划过一道优美弧

线,精准注入碗内。

米面在沸水冲击下翻腾旋转,瞬间化作

一碗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的杏黄米羹。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力道、角

度、水量妙到毫巅,堪称力与美的无声交

响。

而真正的“绝活”,在于那令人叹为



娴熟的冲制技艺。

每一次扣碗验证的毫厘不差,都是对匠心与诚信的无声礼赞;每一次徒弟手腕的沉稳起落,都是古老技艺在时间长河中顽强延续的希望星火。

这碗茶汤,早已超越了果腹之需,

承载着包头人共同的味觉乡愁,凝结着世

代匠人的智慧与坚守,是塞北大地上一份

活色生香、触手可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非遗保护的宏阔背景下,这壶中流

淌的,是看得见的手艺、摸得着的匠心,更

是值得代代守护、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